

语言战“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 语言传播与纷争

许欢欢¹

【摘要】：围绕新冠肺炎事件，出现了众多社会语言现象，如病毒和疾病的命名、专有名词、流行语和诗词、硬核标语等，以语言为载体的信息传播方式也颇为多元。在语言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命名之争、雅俗与文化水平之争、信息传递尺度之争等。本文引入卡尔·布勒的语言理论，按照表征功能、表达功能、意动功能的框架，系统梳理这些社会语言传播现象及其所呈现的纷争，并使用语言工具模型深入剖析。

【关键词】：新冠肺炎 公共卫生事件 社会语言 语言传播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3-0078-06

一、疾病以及特定名词的名实之争

在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之后，人们对其认识和掌握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对其命名，以方便在各种书面和口头的场合交流和表达。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张继先医生最先上报疫情。29日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疾控中心着手流行病学调查。30日晚，武汉市卫健委的一份通知在网上广为流传，次日被《新京报》等媒体广为刊载。在此时期，人们对疾病的发病原理、症状等方面尚未掌握，故在内部文件中称“不明原因肺炎”，武汉市卫健委官方通报中称为“病毒性肺炎”。两个名称都属于排他性表述，这表明当时对该疾病致病机理尚不清楚。在没有新的名称之前，非专业人员一般倾向于用已知的词汇描述，故12月底武汉的8名医生在即时通讯工具中向亲友提醒时，使用了“SARS”“疑似非典”等名称。在此之后，专业的科研机构确定了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分离病毒毒株并完成国家病毒资源库入库工作。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向媒体宣布，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病原体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2020年1月7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众多机构专家联合向《自然》投稿的论文中，将这种新型病毒称为WH-Human-1 coronavirus(武汉一人一1号冠状病毒)。复旦大学姜世勃等建议将冠状病毒命名为肺炎相关的呼吸道综合症，后又建议改为“传染性急性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

自此之后，各种语素相互组合，出现了多种表述不一的疾病称呼，如汉肺、武汉肺炎、中国病毒、新型肺炎、新毒肺炎、新型病毒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正因命名彼此扞格不入，在2月之前，武汉市与湖北省的指挥部名称都不统一，武汉称为“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湖北则称为“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在国外的报道中，也经常使用武汉新型肺炎等称谓，这种命名方式带有地域歧视，也不利于科学研究和临床使用，因此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其暂时命名为“2019-nCoV”，2019代表发现此病毒的年份，n代表新型，CoV是冠状病毒(Coronavirus)的英文缩写，中文可翻译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冗长且较难翻译，故国内的称呼仍旧较为多元。

为了实现命名的规范和统一，中外都在快速行动。2月6日，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按照疫病名称、传染防控、病理症状等七个类别，审定了180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相关词汇英文表达的规范和标准，面向社会和业界发布。2月8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新型肺炎暂时的命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统一称谓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英文

¹作者简介：许欢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7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互联网传播形态与中国传播能力建设研究”（17JJD860003）

名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NCP”。这一名称是根据中国四字词组的语言习惯确定并英译，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名称又有出入。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正式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COVID-19”，“CO”代表Corona(冠状)，“VI”代表Virus(病毒)，“D”代表Disease(疾病)，“19”代表疾病发现的年份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人类新型传染病的命名要遵循“最佳做法”的原则，防止不准确或者污名化的倾向，应避免使用地理位置、动物或食品种类以及引起过度恐慌的术语等。¹另外，国际社会还有专门负责病毒管理的机构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CTV)，其下属的冠状病毒研究组在同日的论文中宣布，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正式分类名为SARS-CoV-2(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号)。两个组织命名不同的原因在于，世界卫生组织关注的是疾病类型，而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聚焦的是病毒门类(Species)的区分，即确定病毒的种、属、科等。除了科学层面的差异外，世界卫生组织的命名考虑了风险沟通的问题，故没有使用SARS以免给人们带来心理的压力和恐惧，也避免了使用武汉的地名。当然，对于两个机构的命名，学者有同意者，也有极力反对者。世界卫生组织定名后，英语传媒中“武汉肺炎”“中国病毒”之类的俗称大幅减少，COVID-19的正式名称快速增加。在中国的官方语言中，仍旧使用“新冠肺炎”这一称呼。而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出于政治利益、以方便民众理解的借口，仍称“武汉肺炎”，并建议媒体使用。

无论是何种命名，究其本质都是试图实现语言传播中的表征功能，不同的名词所反映和体现的实质和本体都是一致的。但同一实体认知的角度和立场的差异，会产生不同语义场域，进而衍生出不同的命名规则。从语言传播的经济性和便利性而言，科学家和各组织机构的命名，显然无法用于日常的交流，也与国家关于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无法兼容，这是COVID-19、SARS-CoV-2等命名未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的原因。中国的一些科学家借鉴早前的萨斯(SARS)的命名方式并与其相区别，提出了塔斯(TARS)、哈斯(HARS)、卡斯(CARS)、帕斯(PARS)等名称，但未获得人们的认可，无法上升为一种语言表达规范。学者通过论文等各种途径，倡导自身的命名规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学者对于这一爆发于本土、对中国乃至全世界民众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病毒的研究处于主导地位，并试图在国际科研界拥有定名的话语权。台湾政客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命名于不顾，通过命名制造两岸隔阂，企图“以疫谋独”。所以，新型病毒和疾病命名之争，是规则之争、话语权之争甚至是政治之争。从科学语言传播层面反观，日常语言传播中的“新冠肺炎”体现的是区别性特征而不是本质特征，缺乏科学性，这体现了科学与日常语言的悖反性。或许将世界卫生组织命名的COVID翻译为“柯维”(或“柯维达”)是一种兼顾的方法，正如当年将SARS翻译为“萨斯”一样。

从中国的语言哲学思想来看，语言传播中的表征功能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实”之辨有相契合之处。西周结束后，诸侯并起，礼崩乐坏，名实散乱，儒、道、墨、名、法各派思想家热衷于讨论名实问题，将之与其政治主张和学说结合在一起，并用批判和分析现实。在此之外，名实之争讨论客观对象和事物的命名问题，穷究语言与客观事物、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其中《荀子·正名》价值最大，总结出事物命名的一套理论和方法。^②在新冠肺炎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除了病毒和疾病的命名外，大量不为民众所熟悉的特定名词(或短语)，其名实之间同样存在争论。如湖北红十字会公告，称向武汉天佑医院、武汉仁爱医院分发的1.8万个口罩是KN95口罩，不能给定点医院一线医护人员以有效防护，但专家驳斥说KN95跟N95只是遵循的生产标准不同，两者的防护效果是同等的；对李文亮医生是否符合“吹哨人”之实的争论；教育部提出“停课不停学”要求，各学校对其“实”的理解偏差所引发的争论等。

二、语言的雅俗与文化水平之争

1月23日凌晨，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1号通告，宣布离开武汉的通道暂时关闭。这则被民间称为“封城令”的通告，标志着疫情已经上升到万分紧急的程度，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激起了巨大反响。自疫情全面爆发以来，武汉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激增，病床、医护人员以及口罩、手套、护目镜、体外人工膜肺(ECOM)等纷纷告急，牵动着国内外爱心人士神经。在中国，人们发自肺腑地喊出“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等口号，激励共度难关。据百度搜索指数显示，1月23日“武汉加油”一词28648次。“危巢之下，岂有安卵”，全国是一盘棋，在党和国家的调遣和号召下，各地的支援人员开始向武汉和湖北迅速集中。与此同时，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也施以援手，筹集了大量物资运往中国。他们在捐赠物资的包装上除了写明捐赠方、收货方，往往还写有一句诗词。此举最早始自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局所标注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此词句迅速在互联网广为传播。此后，在捐赠物资的包装上附有诗句成了日本捐赠物资的标配，如日本NPO法人人心会、日本

湖北总商会等四家机构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舞鹤市捐大连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富山县捐辽宁的“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长崎市捐助各地物资的“崎岖路，长情在”，等等。这些诗词或引用中国诗人创作的古诗，或根据一定的寓意创作，情韵绵长。

这些文雅的词句在受到热捧的同时，又刺痛了我们的神经。最早挑起此话题的是武汉大学的学者韩晗，他在名为“语言和安全”的公众号上刊发了题为《为什么别人会写“风月同天”，而你只会喊“武汉加油”？》的文章，将两者对立起来，认为“武汉加油”精神可嘉，但却显示了我们语言的贫瘠。韩晗之文较为犀利，本意是想表达中国当下修辞传统的缺乏和丧失的问题，但舆论更愿意评判两者到底高下如何。此文之后，《环球日报》胡锡进、《长江日报》肖畅等相继发表了一些评论，或支持“风月同天”的风格，或拥护“武汉加油”的内在精神，更多是调和论，认为两者不能死磕，往哪头使劲都荒诞。

此时，已经从语言的修辞问题演变成成为语言传播的文雅与俚俗、文化素质高下的争论。也就是说，是传播语言表达功能的争论，因其所展现的是发送者的自身状态和特征。20世纪早期的白话文运动之后，中国的书面语言从文言转变为白话文。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白话文经历了欧化的洗礼，又经历了战争、政治和网络语言的层层熏染，语言保持了应有的活力，表现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但与文言文相比，风格越来越倾向于浅显直白、无厘头，篇幅上鸿篇巨制内容却空洞无物、了无生气。当然，近些年随着各层面对古典文化的重视，优美的古典诗词和文句受到人们的追捧，情形有所改观。据相关媒体报道，日本捐赠物资上的诗句，有一部分出自于中国人之手，这让国人稍觉安慰。语言传播中出现的争论，实际上折射的是人的精神状态和特征。在日本人使用诗句的刺激下，中国语言传播中“石化”表达的问题或可受到人们的进一步重视。

三、语言传递的方式与尺度之争

新冠病毒传播途径多样且隐蔽，被感染后没有特效药物，治愈周期长、难度大。在此情形下，戴口罩、勤洗手等是避免感染的有效手段，闭门不出、居家隔离成为预防病毒的无奈选择。但病毒高发期正值中国春节期间，是走亲访友、假期消费的高峰期，各基层组织机构为宣传预防知识、号召人们不出门，采取了各种传播手段和方式。各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针对疫情问题，面向所管辖的民众发布了大量书面语言写成的文件。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和支援队伍，需要跟病人保持有效的语言沟通。这些都是语言传播意动功能的实现，即以特定的方式向某一主体发送有效信息。

第一，政府公文的信息传递与适用性问题。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发布的公文是最权威的指导纲领，发挥制定防控、救治的政策和措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等方面的作用。公文传播的第一个问题是信息模糊、彼此冲突。此次疫情形势陡然紧急，各省快速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各级政府指挥部发布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公文，组织本区域内应急处置工作。但在紧急情况下，少部分公文的语言问题影响了公文的传播。1月25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9号通告：“自2020年1月26日0时始，除经许可的保供运输车、免费交通车、公务用车外，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市民确有通行需求的，按指挥部第8号通告执行，各社区配备足够车辆保障需求。”该公告发布后，网络上争议之声四起：市民不清楚自己的车辆是否被限行，怎样才能知道是否被限行；“各社区配备足够车辆保障需求”，到底是表达陈述之意，还是祈使之意。为此，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在当日对该通告紧急做了四点补充说明：“交管部门将通过智慧交通系统，对禁止通行的机动车通过手机短信形式提前24小时告知车主，未接到短信通知的机动车可以通行。”这回应了市民的关切，却没有点明具体会在何时告知，市民仍旧是一头雾水，争论不断。公文传播的第二个问题是语言繁复，不少公文动辄数千字，这固然有工作细致的一面，但不乏大话和套话，民众阅读和理解也存在困难。以此反观，武汉新任市委书记王忠林到岗后，2月10日发出的第1号令，提出力量下沉、定时通报、严格考核三项要求，全文仅238字，堪称最短公文。影响公文传播的第三个因素是语言含混不清，如武汉市政府相关人员从武汉市红十字会提取1箱口罩，在网上引起极大争论。而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在网站发布《关于防疫专班工作人员领取防护口罩的情况通报》，语义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和逻辑性，同样引发不少争议。第四个问题是公文文种和文号的滥用。各县级指挥部发布的公文不少使用“公告”“令”文种。按照《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规定，这两个文种适用对象是党和国家的高级管理机关。文号滥用表现在云南大理卫健局2月2日的《应急处置征用通知书》征用重庆口罩，引发各方强烈不满。舆论更注意到该文件的文号为“[2020]1-61号”，在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大理的征用次数

过于频繁。这些公文语言传播问题让民众接受产生了困惑，引发了争论，对特殊时期的政府公信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伤。

第二，媒体发布与高光词汇的频繁使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类信息铺天盖地、纷至沓来，人们渴望汲取全面而广泛的权威信息，以消除内心的恐惧和不安，通过确定的信息来对抗不确定的感染风险。民众获取这些信息渠道，不是登录政府或疾控专业机构的网站，而是通过各种媒体。与萨斯等其他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新冠肺炎所处的是社交媒体空前发达的时代。自媒体、社交工具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递和压缩着各种信息，人们与信息之间看似零距离，实际又存在巨大的信息鸿沟。世界卫生组织将这一现象称为“信息过剩”，即信息过于丰富，有些信息准确，有些信息不准确。这使得人们难以获取可靠的信息，或者在海量信息面前莫衷一是。这加剧了谣言的传播和泛滥，创造了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加剧了人们的焦虑与对立情绪。在本次新冠肺炎期间，主流媒体起到了发布权威信息的媒介作用。与自媒体采取各种“吸睛”标题相比，主流媒体在发布这些信息时，标题使用了“高光”词汇，如“权威”“实用”“重要”“紧急扩散”“定了”“刚刚”“关注”“快讯”等。这一语言传播策略将重要信息与其他信息做了醒目区分，起到了及时传递重要信息的作用。

第三，硬核标语、大喇叭广播与基层民众动员。标语是用简短有力的语言写成的带有社会动员目的的口号。标语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最早且最深入人心的标语或许为陈胜、吴广所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标语符合了战乱年代揭竿而起的群体心理，一时间从者云集，起到了很好的动员传播效果。标语一直长盛不衰的原因在于其目标对象是群体。在特定的社会氛围之下，群体具有随波逐流、情绪冲动和相互感染的特征，能够如荷尔蒙一样催化和固化群体的特征。^③改革开放以来，标语的政治鼓动功能被削弱，其宣传和传播功能得到强化，如标语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中曾发挥重要作用。春节前席卷全国的疫情，再一次让标语在基层特别是农村基层的公共卫生宣传领域得到淋漓尽致的运用。各地在街道、广场、村头等处悬挂了大量横幅，如“我在家，我骄傲，我为祖国省口罩，我为自己省钞票”，“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不戴口罩你试试，试试就逝世”，“今年上门，明年上坟”，“今年过年不串门，来串门的是敌人，敌人来了不开门”，“发烧不说话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出来聚会的是无耻之徒，一起打麻将的是亡命之徒”，“串门就是相互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老在家防感染，丈人来了也得撵”，等等。这些横幅内容多为号召和规劝民众讲卫生、不出门、少聚会、主动上报病情等，在形式上对仗工整、琅琅上口、醒目刺目，语气简单粗暴、干脆直接、恫吓威胁，起到一目了然、善读好记、立竿见影的效果。支持者认为这种标语适合乡下人文化素质不高的特点，凸显了民间情怀和智慧。反对者则认为这是把愚昧当民俗文化，这类标语缺乏基本的逻辑，缺少人文关怀，法治意识淡漠，凸显现代教育和国家治理的失败。在网络上，双方围绕这些硬核标语争论不休，彼此无法说服对方。这种争论也凸显了语言传播时，到底是强调动员效率，还是强调现代文明：这并不处在同一个逻辑层面。

紧急疫情当口的基层民众动员的另一利器是高音大喇叭。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迅速建起了一套基层广播网，高音喇叭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成为国家象征，是农村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④通过高音喇叭，基层被高效地整合到国家政治议程中，开创了历史上的“声音政治”时代，语言的单向传播和倾听被广泛地用于农村动员，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之事。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的国家权力运作发生了改变，高音喇叭的地位大幅下降，其角色也转换为“广告载体”。这显示了乡村社会的运作结构从“管制”转向“治理”，高音喇叭的作用发生新变，开始在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等关键时刻发挥“应急广播”的重要作用。^⑤在本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乡村固定高音大喇叭以及部分市县街道流动巡逻车扩音喇叭，承担了应急广播的功能：循环播放各级政府公告、本地疫情通报、预防病毒的顺口溜、劝阻出门和串门等。喇叭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各项信息及时向年龄偏高且不会使用现代通讯工具的民众传播，放送信息者多为本地干部，容易获得更大程度的信任。其次，声音传播介质的喇叭更能涵纳横幅文字所不能承载的丰富而生动的信息，警醒作用更为明显。在网络中，喇叭传播受到广泛关注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其语言的形式，主要有两个角度的争论。一方面，从事喇叭传播的干部多采用当地方言或带有方言味的普通话，属同一方言区的网民会认为亲切，而其他网民则更多带着戏谑态度围观甚至是嘲讽。另一方面，广播中带有责骂、挖苦等语气，如“出门戴口罩能害你吗？露大脸，呲大牙，就你脸白，就你脸香，就你脸上抹了护手霜？”“搁家里安安稳稳坐着，喝点茶水吃点瓜子能憋死吗？叫你朝东你朝西，叫你砸狗你撵鸡，死皮不要脸！”这种语言传播方式在本质上跟硬核标语如出一辙，饱受争议。但我们不能否认，大喇叭这种语言传播方式与全国自上而下的紧急公共卫生动员相结合，爆发出巨大的宣传力量，对基层的卫生防疫工作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第四，灾难语言传播的尺度。冠状病毒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灾难，患者在病痛面前苦苦挣扎，医护人员千里驰援，基层干部夜以继日摸排信息，湖北人在高速公路上流浪，钻石公主号成为泰坦尼克号……人们需要用语言彼此传达安慰和悲悯，传播温暖和关爱，增强力量和勇气。这是诗歌和艺术的领地，文艺界发出了“文学抗疫”的倡议。而少部分诗人在诗性语言的传播方面，突破了诗歌的底线：将湖北人视为寇仇，代表作是云南彝良县文联主席陈衍强的《仰望天空》：“为防止武汉的疫情蔓延/我在云南彝良/不仅以驻村扶贫的理由/阻止了一个地上的湖北佬/来我家过年的想法/还像伊朗担心无人机一样/随时仰望天空/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致谢病毒激励民族精神，代表作是《“感谢”你，冠状病毒君》：“我要大声地感谢你，冠状病毒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那叫‘配合’！”；讴歌领导干部的奋勇直前，代表作是《我对高山流水说，请你善待人民的公仆初心》：“他们(干部)走在白衣天使和‘藏青蓝’队伍的前头/走进抢救病人、守望平安的队伍前列”，等等。这些所谓诗歌拉低了艺术语言传播的水准，将深邃的悲剧改写成浅薄的喜剧，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争论，甚至有人联名上书要求中国作家协会将相关作者的会员资格予以解除。这种联名之举充满戾气和暴力，用行政手段解决语言问题并不足取，但足可说明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语言传播需要遵循一定的尺度和边界。

第五，医患语言传递与非正式语言沟通。我们注意到，援鄂医疗队医护人员临床救治的病患很大一部分是老年人，他们大多只能使用本地方言。医患之间围绕病情、用药等方面高频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跟当地老年病人交流比较困难。为此，山东第五批援助湖北医疗队中的齐鲁医院医疗队2月初来到武汉后，很快编写出《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实用手册》，并配音频版。这套方言手册包括称呼常用语、生活常用语、医学常用语和温馨用语四个部分，收录的词汇都是医患间的常用词。此举促进了双方交流和医疗施救，受到称赞。医疗队自发编写后，教育部组织“战疫语言服务团”推出“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在线查询工具，遴选医疗场景常用的词语和短句，完成九个地市方言和普通话的对标发音，供患者和医护人员使用。^⑥但也有论者认为此工具无法推送到使用者手中，分类方式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形，查询和使用不便等。新冠肺炎病人有一部分是重症患者，需要在ICU病房抢救。在ICU病房，医护人员需要佩戴防护服、护目镜等，彼此语言沟通不便。于是医疗队又创制了用于抗疫一线的医用手势，涉及抢救、检查、治疗和生活等方面，包括换瓶、抽血、打针、喂饭、测体温、采集咽拭子、抢救等。手势属于非语言交际符号，节省了沟通时间，提高了医护人员之间的工作效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迫切需要通过手势语言交流的是聋哑群体。这一群体多处于信息孤岛，对疫情进展获知严重滞后，没有手语翻译，根本无法获知外部的紧急状况，也无法跟踪快速更新的新闻。他们无法向医生传达病症，医生也无法告知专业词汇，彼此沟通十分困难。相关人士组织“手语者”的公益小组，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传递服务。

四、主要结论

本文以新冠肺炎为例，运用卡尔·布勒语言工具模型和理论，分析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语言传播现象及其纷争。不明原因肺炎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客体和事物状态，在不同语境(如中英文等)中，不同主体(如科研人员、世界组织、中国政府等)，在不同的认知阶段(不明原因、基因测序等)，按照不同的原则(如疾病类型、病毒门类)，利用语言的表征功能对其给予命名，从而产生了表述不一的名称。“风月同天”“武汉加油”是信息发送者围绕新冠肺炎实现语言的表达功能，而雅俗之争的实质是表达方式的不同，其背后蕴含的是发送主体的价值状态和症候。新冠肺炎的信息需要通过不同途径向接收者传递，政府权威的权威发布、硬核标语和大喇叭的基层动员、灾难语言使用尺度、医患的互动交流等都是语言传播意动功能的实现。

因此，语言传播处于复杂的语义场中，现运用卡尔·布勒语言工具模型将其呈现(图1)。中间的圆圈象征着新冠病毒(或肺炎)这一具体的声学现象，其中三个可变因素(三角形的三个边)，以三种不同方式确定了各自符号等级。一方面，三角形比圆围得小，这说明了声学现象的抽象关联原理，即新冠病毒(肺炎)的音波并非全部与三个功能有关。另一方面，三角形超越了圆围，表明事实在声学现象中呈现时，需要得到感知的补充，即对新冠病毒(肺炎)的事理解需要人们对社会的外在感知。图中平行线象征着语言符号复杂的语义功能：与客体和事物状态相协调，实现语言传播的表征功能，如对疾病和病毒的命名；呈现发送者内在状态的症候，如语言雅俗背后的文化水平之争；召唤接收者的传播方式与信号体系，接收者的内在或外在行为都受其引导。语言传播工具模型是建立在社会语言交际和理解基础上的，在传播过程中实现了语言的三种功能。^⑦具体到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语言首先是符号，用来标记陈述新冠病毒(或肺炎)；其次语言是一种工具，将发送者自身对这一事件的理解表达出来；

最后，语言还是一种信号，各级组织和机构、民众、医生、患者获取关于公共卫生的信号并作出反馈。但语言本身所传达的意义与三个功能之间存在着“適切”性问题，在模型中由圆圈与三角形的相交来表现。也就是说，语言传播还受到外部环境、时间和空间、心理状态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这是导致围绕语言产生纷争的重要原因，在本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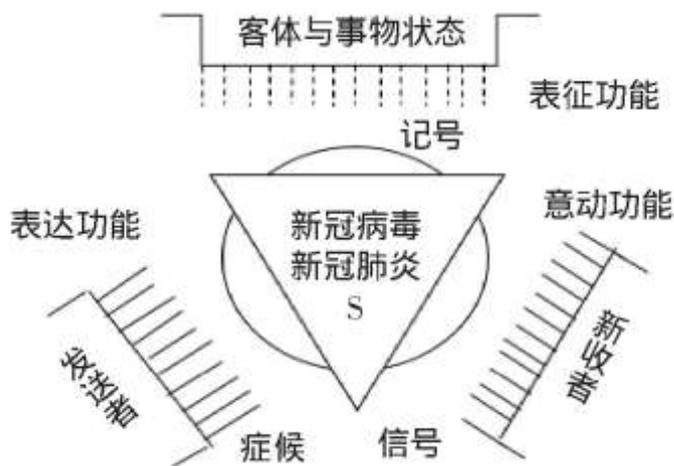


图1 新冠病毒(肺炎)语言传播工具模型

注释：

1 在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因命名导致的问题不在少数，如2009年的H1N1病毒，被称“猪流感”，事实上这一病毒通过人而不是猪传播，但埃及大范围宰杀猪，引起当地食用猪肉群体的抗议；2015年“中东呼吸道综合症”(MERS)引发了对中东民众的歧视。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制定了病原体或疾病命名的七项指导原则。

2 参见孙炜：《从“名实之争”看先秦诸子对语言与客观事物关系的探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1期。

3 韩承鹏：《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4 何钧力：《高音喇叭：权力的隐喻与嬗变——以华北米村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4期。

5 潘祥辉：《“广播下乡”：新中国农村广播70年》，《浙江学刊》2019年第6期。

6 湖北绝大部分属于北方方言区，但咸宁赤壁等属于赣方言区。方言划分不是按照行政区界定，而“战疫语言服务团”提供的查询工具，按照九个地市区分发音，因此使用范围和效果会打折扣。湖北方言分区情况，可参考赵元任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7 齐沪扬：《传播语言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